

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述略

徐永文,白新良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清代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书院经济状况恶化,毁废严重。书院开始了全面衰败的阶段。

关键词:清代;嘉道咸;书院;发展;衰落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4-0058-05

一、书院讲学的新特征

清代书院,按其讲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以应科举,学习八股文为主的书院。第二,以讲求程朱理学为主的书院。第三,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第四,以学习“经世致用”为主的书院。清代书院讲学以第一、第二类最为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已出现了新特征。其主要表现是,以讲授汉学、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影响不断扩大,以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影响最大,同时提倡“通经致用”的经今文学派兴办的书院也初步得到发展。

诂经精舍始创于嘉庆五年(1800年)。嘉庆初年,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曾于西湖孤山之麓筑屋50间,组织一些学者编修《经籍纂诂》。嘉庆五年,他任浙江巡抚后,遂为之题名诂经精舍,专祀汉儒许慎、郑玄,“选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习业其中”^[1]卷二十二《杂记》上。“课经义、史学、诗赋。”^[2]卷十六由他和著名汉学家王昶、孙星衍轮流主讲,从而在教学内容和祭祀对象上都完全摆脱了理学的束缚。“其课士,月一番三人迭为命题。”“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扁试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讲议服物典章,辨难同异,以附古人教学藏修游息之旨。”^[3]卷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其中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成就也相当可观。“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吵面赤。”“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

不可胜数。东南人士之盛,莫与为此。”^[3]卷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仅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载,其著名者即有“洪银煊、洪震煊、蓄养源、……张立本辈凡三十余人,为一时之盛”^[1]卷二十二《杂记》上。对于汉学的广泛传播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州学海堂初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原附于广州城西文澜书院之内。道光四年,迁建城北粤秀山下。当时,阮元正任两广总督,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具有十分丰富的办学经验。因而,在筹建学海堂过程中,对其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针对当时各地书院院长多由上司勒荐,不学无术、坐支束修、并不到馆任教等弊端,从道光六年起,阮元断然革除院长、山长称号,“永不设山长,亦不允荐山长”^[4]。而由阮元本人通过访求任命山长。在教学内容上虽仍如杭州诂经精舍一样“课举贡生监已经解诗古文词”,但在教学方法上却更加注意调动生徒的积极性。要求生徒“各因资性所宜”,于《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中,“听择一书专习。或先句读,或加评校,或抄录精要,或著述发明,学长稽其密疏,正其归趣”^[4]。“该生等于学长八人中择师而从,谒见请业,庶获先路之导。”^[4]为了激励生徒向学,还改变原来膏火奖赏办法,规定:“有随课之奖,无常课之额。”^[5]卷十这种教学和学习方法,不但教师可以扬长避短,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且学生也可因此而缩短战线,能够较快地搞出学术成果。据统计,学海堂的主讲名师,先后有55人;有著述问世的学生,可查者有300余人,几千种书^[6]。对于当时和此后学术

* 收稿日期:2006-12-18

作者简介:徐永文(1974-),男,江西余干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

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阮元和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带动下,嘉道时期,全国各地又涌现了一大批汉学学者和以讲授汉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与此同时,主张“经世致用”的经今文学派也开始渗入书院讲学。其中,较有影响的两个学者是李兆洛和龚自珍。李兆洛(1769—1841),嘉庆十年进士,在学术观点上,他极力推崇公羊学派,而猛烈抨击郑玄。辞官归里后,致力于教育凡20余年,先后主讲于安徽怀远真儒书院、安徽安庆敬敷书院。从道光三年起,又长期主讲江苏江阴暨阳书院。龚自珍(1792—1841),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道光进士,曾官礼部主事,是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经文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执教于浙江杭州紫阳书院和江苏丹阳云阳书院。在他们的宣传下,今文经学逐渐成为显学,改良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重视,对于近代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

乾隆中期开始,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书院规章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其中,尤以书院山长聘请不得其人对书院教育影响最大。早在乾隆时期,一些书院中即出现了聘请山长时,“向来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荐,遂至徇情延请,有名无实”的情况^{[7]卷三九六}。嘉庆时期,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据王昶《天下书院总志序》一文记载,当时不少书院“为郡县者据为己有,且各请院长以主之。而所谓院长,或为中朝所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然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处其中,往往家居而遥领之,利其廩给,以供糊口,甚至诸生有终年而不得见,见而未尝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之旨,茫无所解”^{[8]卷六十八,天下书院总志序}。为此,嘉庆二十二年时,嘉庆皇帝亲颁谕旨:“各省教官废弃职业,懒于月课,书院、义学夤缘推荐,滥膺讲席,并有索取束修,身不到馆者,殊失慎选师资之意。着该督抚学政等,务延经明行修之士,讲习讨论,如有学品庸陋之人,滥竽充数者,立即斥退,以励师儒而端教术。”^{[7]卷三九六}但因吏治全面腐败,各级官吏皆视同具文。至道光时期,上述情况非但没有扭转,反而进一步恶性发展,甚至还出现了教谕、训导或知县兼充书院山长的情况。因而,道光皇帝又连颁谕旨。其中,道光二年谕旨称:“各省府厅州县分设书院,原与学校相辅而行。近日废弛者多,整顿者少;如所称院长并不到馆及令教职兼充,且有并非科第出身之人膺居是席,流品更为冒

滥,实去名存,于教化有何裨益。着通谕各直省督抚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其向不到馆支取干俸之弊,永行禁止。至各属教职,俱有本任课士之责,嗣后亦不得兼充,以责专成。”^{[7]卷三九六}道光十四年,他又进一步作出规定,“嗣后各省会书院院长,令学政会同督抚司道公同举报。其各府州县院长,由地方官会同教官,绅耆公同举报。务择经明行修之人,认真训课,概不得由上司挟荐,亦不得虚列院长名目,并不亲赴各书院训课,仍令学政于案临时,就便稽查,以昭核实”^{[7]卷三九六}。道光十五年时,他又重申,“延请院长,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不得徇情滥荐”^{[7]卷三九六}。在此同时,他还亲为湖南长沙城南书院、福建福州凤池书院书额以表示自己对书院教育的关心,下令表彰教绩突出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院长欧阳厚均以为各地树立榜样,但是,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实际情况仍是每况愈下。以至揭露有关山长荐举黑幕的文字俯拾即是,如道光间,直隶滦城知县桂超万指出:“迩来书院虽设,大抵上官荐引私人食干俸而已。久之经费遂为不肖官绅所侵,而堂舍因之易圯。余所见闻,远近一辙。”^{[9]卷一五}道光《缙云县志》载,“今他郡县之书院,名人文之藪,而多以资大人先生退志之区。能文之士,月再趋焉,徒以侈结纳,耀声誉,博膏火,而教之实无闻焉。”^{[10]卷四}对此,时人邹贤峰讽刺道:“天下书院,虽无讲学之禁,一变而废讲课文,再变而营私射利,三变而庐舍一空。山长有所谓干修脯,生徒有所谓虚廩米者,则书院之设,亦等饩羊之徒存矣。”^{[11]卷四}尽管有个别官吏对此予以抵制,如道光间何愚任职云南二十年,“凡书院山长,必素悉其品学兼优者而后敦请,否虽大吏荐囑弗顾也”。同时,他还批评道:“余不解今之以门外汉充山长,或足不履馆,而虚支修脯者何谓也。得毋有愧于陈文恭公耶。”^{[12]卷三}但是,因为社会黑暗,这股风气根本无法煞止。咸丰时期,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如咸丰《定州续志》载当时书院情况是:“流弊日生,或瞻徇情面,推荐所亲;或要路求书,冀图沾润,以致糜修脯,有名无实。”^{[13]卷一}“计自修脯稍丰,主讲一席,谋之者视为利藪,恒挟大力而来。关聘既具,往往别觅径途,终岁不一至,或岁仅一至焉。名为院长,而生徒以识面为难,司牧造士婆心,付之逝水矣。”^{[13]卷一}其中定州定武书院,“近年山长多由外荐,主讲者久不到馆,虚糜公项,寝至肄业生童无一住院者。”^{[9]卷一一七}直隶近在畿甸,尚且如此,其他各省书院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据时人记载,陕西书院山长“多由土人钻

穴求上司荐剡，书院遂如官缺，全操上宪，而不由绅士”，“竟有以毫无学品之人为掌教者，或掌教而全不言教，惟奉行月课故事；或掌教者留衙署，别司幕事，食书院之俸，并不一到书院，遂使书院，学徒无弊不有”^{[14]卷八}。“自书院兴，私塾伙，名属胶鬲，半为师儒颐志之地，不惟于教事多旷，即睹廨署之隳圯，亦视如传舍，而莫之一稍葺焉。”^{[15]卷三十八} 贵州书院，“终年不课者有之，或恃大吏荐剡，名为主讲，未尝诣书院讲课者有之，甚至侵蚀经费者有之”^{[16]卷十九}。与此相一致，生徒招收，甄别考试等也是黑幕重重，“即奉为岁时考课者，亦罅漏补苴”^{[17]卷五}。“朔望一集，事讫散去。”^{[18]卷五}“即甄别无名者，亦可任意填写。”^{[19]卷七} 为此，嘉道以后，各地书院普遍重订章程规约，或改变山长延聘办法，或加强对生徒院产管理，如于山长聘请，有的书院规定：“山长由绅士于本县科甲中选，原与上宪无干。”^{[20]卷二} 有的书院规定：“书院掌教先生由本处绅士延访文行兼优之科甲呈由县官聘请，不得将干食束修，不亲到馆之人滥充讲席。又本县绅士呈议定掌教先生，县官亲故及各处函荐者俱不许延请；如县官徇情延请，其束金即由县官赔出。”其县官，教职同年并佐贰营员之亲族同乡，俱不许延请”^{[21]卷四}。有的书院还规定，“院长亦归绅士延请，且必须常年住院，日集生童朝夕讲贯，庶不至有名无实”^{[13]卷一}。关于膏火发放，院产管理，不少书院规定，“膏火支放不经官吏”^{[22]《教育志》三}。“将书院事宜并地亩底册统交绅士公同择人专心经理。”^{[13]卷一} 但也收效甚微。这样，师资水平的普遍下降和书院各种规章制度的破坏使得书院教育陷入了危机之中。

三、书院经济状况恶化

嘉道咸时期，各地书院普遍出现经济危机。除少数书院由官府派拨田地亩外，多数书院皆是靠官绅捐款。这在社会颇为富庶的乾隆时期尚可支撑，嘉道以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之中，官绅捐款明显减少，书院经费不足的矛盾充分暴露。如直隶盐山香鱼书院，建于乾隆三年，“顾岁入无几，仍不能延师课士。县令之右文者，间或捐俸月课，不久旋罢，书院渐至圯废。”^{[23]卷五} 直隶广宗凤台书院，建自乾隆三十一年，“然因款项无多，束修微薄，既难延请经术湛深之儒，以充讲师；又不能购置经史子集书籍，故设立百余年，而县内登科者，寥寥无几，不能与他县比肩。”^{[24]卷八} 直隶获鹿鹿泉书院，“书院旧设经费，每年所出，甚属寥寥，除山长修仪支送外，肄业生童不堪培养”^{[25]卷八}。湖南孟县学山书院，建于康熙年

间，嘉道时期，因为“束修无出，久成空馆”^{[26]卷五}。河南林县黄华书院，久负盛名，但“因书院并无常年经费，不能延师招徒。县令右文者，间或捐俸课士，然课或旋举旋罢，院亦旋修旋圯”^{[27]卷七}。山东寿张寿良书院，系道光五年知县萧梦兰捐建，“特经费无恒产，萧去课止”^{[28]卷二}。山东泰安岱麓书院，自乾隆五十七年建后，“日久，经费不足，废而不举”^{[29]卷四}。奉天辽阳囊平书院，建自道光年间，但建后不久，即以“经费阙如”不能延师课士，“旷废几五十年”^{[30]卷一五〇}。江苏东台西溪书院，建于嘉庆十年，“书院未有膏火经费，生童不能住院，至于应课，亦属寥寥”^{[31]卷十二}。江西分宜钤阳书院，嘉道间，“肄业之膏火阙如，山长之修脯不继，皆缘度支未充，是以经制多疏”^{[17]卷五}。江西瑞昌东皋书院，系嘉庆十一年知县筹建，“因经费无常，两年辄止”^{[32]卷二十二}。四川威远凤翔书院，嘉庆间，以资金不足，“生息微薄，无以延师，亦有名无实”^{[33]卷二}。据时人黄爵滋所见，当时州县书院“废弛仅存其名十之七、八”^{[34]卷四黄爵滋，奏请综核名实疏}。为了维持生存，一些地方官员或主持人分别采取各种方法，有的是设法转嫁负担。如山东泰安岱麓书院即于道光七年稟府下令“所有修金分府属各按季摊解”^{[29]卷四}。有的则千方百计向社会募捐，充当高级乞丐的角色。如咸丰元年时，安徽祁门东山书院即“启请诸君子亲诣书院书名、书数、事竣之日，仍照徽郡之已事，以捐至千金及二百金以上者立祠书院之中，岁时奉祀，亦崇德报功之义也。其有旧家大族，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符享祀之数者，如愿量力捐输，均得列石，以垂久远焉”^{[35]卷十八}。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嘉道以后，人口激增，广大百姓生计艰难，无力捐款；“而地方士大夫率多自急其私，雕墙峻宇，经营家室，惟恐其不华且固，而于出身之地，曾莫顾而问焉。”^{[36]卷二} 效果并不理想。二是嘉道咸时期，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贫民抗租抗粮斗争也彼伏此起，所有这些，也使不少以地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书院濒临绝境。如山西洪洞玉峰书院，乾嘉间，多次以劝捐银两置买田亩，收取租息，以供书院日常开支之用，但嘉道以后，却因“佃种拖欠，久渐废弛”^{[37]卷十}。咸丰间，云南宣威州榕城书院“田亩荒芜，租石未能全收，仅得十之二、三”^{[38]卷一三五}。为此，有的书院特于章程中规定：“不许抗租，交县追比。”^{[39]卷七} 然而，此时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斗争使得清政府都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谁还理会一个小小书院主持者的恫吓！三是因为吏治腐败，贪官污吏竞相侵吞院产，也使不少书院奄奄一息。乾隆后期以至嘉道咸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政府公开卖官鬻

爵，“知州多属赏郎”^{[40]卷八}。官吏素质明显下降，贪风愈演愈烈，这样，书院田产、房屋以及存当生息的各项基金也都成了中下级贪官污吏觊觎的目标，如直隶南宮东阳书院，乾隆间公捐银两甚多，但因吏治腐败，“不数十年，官吏侵牟殆尽，房宇因而倾圮”^{[41]卷六}。直隶长垣寡过书院，至道光中“前捐膏火及旧存息项，悉经当事挪用”^{[9]卷一六}。直隶望都康衢书院，自嘉庆四年修后，几十年中无人过问，以致“学田百余亩，奸胥侵蚀殆尽，院宇倾圮，移瓦木而济他工，曾四十余年，盖将鞠为茂草矣”^{[42]卷五}。江苏常州延陵书院，原有乡民捐田 510 亩，“兵后尽被盗卖”^{[43]卷三}。江苏清河临川书院，共有房舍 22 间，咸丰间，“官吏占据，将假而不归”^{[44]卷十}。贵州安顺凤仪书院，道光二十六年，曾由知府朱德璉订立规约章程，刊石为记。但“积久弊生，竟有佃民裁改块角而不知，书役侵蚀租谷而不觉，甚至月课膏火，亦有不敷，年例开销，渐成虚冒”^{[45]卷十八}。为此，一些地区被迫将一些书院改归民办。如嘉庆二十年，广东廉州知府建立大廉乡、六湖乡两所书院，即“听绅士自行经管，延师课士”^{[46]卷一四一}。福建龙岩新罗书院，原为民办。嘉庆间，“知府郭正谊以董理或不得人，间有浮费，将膏火掣归官办。嗣胥吏据为利藪，租税半入私囊，刁佃亦乘间贿差，通同吞欠，膏火虚悬，会课稀少，书院堂舍渐次坍塌”^{[47]卷四}。为此，道光九年，后任知州彭衍堂不得不将该书院重改为民办。因此之故，道光间，民办书院比例有所增长。然而，由于在侵吞院产方面，和地方官吏相比，经办绅士也毫无逊色。于是一些改为民办的书院又不得不作出各种规定，对管理书院绅士加以限制和约束。如江苏宿迁钟吾书院规定，“董事必须公举，住院经理；其子弟不得参与公款，不许私储，不准挪移，每年出入款项，皆须逐细报销”^{[48]卷二}。即使如此，各地书院院产遭到侵蚀者仍是越来越普遍，全国书院大都处于风雨摇摆之中。

四、书院毁废严重

嘉道咸时期，由于战争破坏，书院毁废情况严重，数量惊人，因为吏治腐败，嘉道咸时期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较之乾隆时期已经明显减少。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更使全国不少地区书院数量呈现了负增长的严重局面。如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作为战争的中心地区之一，河南、湖北两省书院遭到极大的破坏。而终嘉庆一朝，两省新建书院仅仅各有三所。而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更使全国尤其是大江南北地区书院遭到了一场浩劫。其中，广西、贵州、两湖四省为太平军首义

和经行之处，据统计，当时四省新建书院总共只有 17 所，而毁废书院竟达 65 所之多。如广西来宾萃英书院，“咸丰之乱，院宇悉毁”^{[49]卷四}。广西贺县临江书院，“咸丰兵燹，产业既无可稽，膏火遂无从出，月课一事，久如告朔餼羊”^{[50]卷六}。贵州遵义启秀书院，“咸丰中，杨逆为灾，书院并书籍付之一炬”^{[51]卷十五}。久负盛名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也“斋舍倾圮”，毁坏严重^{[52]卷六十七}。上、下两江与浙江各省由于太平军和清军长期厮杀之地，书院破坏尤其严重。如江苏句容华阳书院，“兵燹后，圮废无存”^{[53]卷三}。扬州安定、梅花两书院，“咸丰三年，夷为平地”^{[54]卷三}。泰州胡公书院，“咸丰粤匪之乱，贼氛逼近，书院停课，屋宇荒废”^{[55]卷六}。江宁凤池书院，“经贼毁拆，今成桑园”^{[56]卷五}。高淳学山书院，“兵后田地荒芜，典息全尽”^{[56]卷五}。安徽由于地近太平天国天京，为了防御太平军进攻，清朝地方政府集资练勇，各地书院存款大都被提取一空。如寿县寿阳书院，“咸丰中提书院经费作军费，遂至中废”^{[57]卷九十二}。全椒囊水书院，“咸丰四年，公提经费募勇，书院遂废”^{[57]卷九十二}。英山凌云书院，“咸丰间历遭兵燹，屋舍所存无几”^{[57]卷九十二}。泗州夏邱（兴学）书院，“咸丰初，洪杨兵起，书院公款尽数提出募勇，院宇倾圮”^{[57]卷九十二}。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浙江书院毁坏者不下 50 余所，有名的杭州诂经精舍也“鞠为邱墟”^{[2]卷十六}。江西因是太平军与清军长期对垒之处，书院毁坏者至少 39 所，其中不少还是直接毁于清军之手，时人王德固揭露道：“顾自粤逆扰江右，十数年来，赣城幸得不毁，而统帅者屯宿其中十数年之久。兵勇折椽代薪，毁户支榻，岌岌乎栋折榱崩。若更历年所，势将荡为平原。”^{[58]卷二十二}即使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主要涉及地区，书院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山东德州繁露书院，“至咸丰间，戎马倥偬，渐见废弛”^{[59]卷七}。直隶蠡县成才书院，太平军北征时，“设局办团，经费不支，暂将书院公项挪用，至今十余年，未议捐补”^{[60]卷三}。还如河南禹县凤台（丹山）书院，“咸丰军兴，书院恒充往来军帅馆舍，弦诵遂辍”^{[40]卷八}。太平天国革命之外，道光、咸丰间云贵回民起义，安徽、山东捻军起义等也都使各地书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咸丰间，由于镇压杜文秀起义，云南书院毁废者竟达 83 所；陕西书院以咸同回变而“兵燹迭经，学务废弛”^{[15]卷三十八}。不少书院“倾塌无存”^{[61]卷三}。还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也导致了一些书院毁废。如二次鸦片战争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英法军队驻于上海蕊珠书院，书院建筑因以“毁捐大半”^{[62]卷九}。咸丰十一

年,因西人要求归还天主教堂遗址,上海敬业书院被迫移建^[62]卷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嘉道咸时期,书院讲学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影响不断扩大,以讲授“通经致用”的书院崭露头角。但讲授汉学的书院同讲授八股文和程朱理学的书院相比,数量毕竟只占少数,影响有限。而讲究“通经致用”的书院处于草创时期,势力太小。书院数量虽继续增长,伴随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政局动荡,吏治腐败和国家财政危机,受此影响,书院制度腐败,师资水平严重下降,书院经济状况恶化,毁废严重。书院发展开始全面步入腐败衰落的阶段,对于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

响。

参考文献:

[1] 《履园丛话》[M].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113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光绪杭州府志[M]. 台北:台湾成人出版社,1974.

[3] 孙星衍. 平津馆文稿[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923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林伯桐. 学海堂志[M]//光绪九年(1883)续刊本. 赵所生,薛正兴. 中国历代书院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5] 民国南海县志[M]. 宣统三年(1911)刻本.

[6] 李国钧. 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J]. 岳麓书院通讯,1983(1).

[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4 月第 1 版.

[8] 王昶. 春融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37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 光绪畿辅通志[M]. 光绪十年(1884)刊本.

[10] 道光缙云县志[M]. 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11] 同治乐安县志[M]. 同治十年(1871)刻本.

[12] 道光广南府志[M]. 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13] 咸丰定州续志[M]. 咸丰十年(1860)刻本.

[14] 光绪同州续志. [M]. 光绪七年(1881)刻本.

[15]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 [M]. 1934 年铅印本.

[16] 咸丰兴义府志[M]. 咸丰四年(1854)刻本.

[17] 民国分宜县志[M]. 1940 年石印本.

[18] 道光江阴县志[M]. 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19] 民国嘉定续志[M]. 1930 年铅印本.

[20] 道光章邱县志[M]. 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21] 光绪唐县志[M]. 光绪四年(1878)刻本.

[22] 民国安徽省通志稿[M]. 1934 年铅印本.

[23] 民国盐山新志[M]. 1916 年刻本.

[24] 民国广宗县志[M]. 1933 年铅印本.

[25] 光绪获鹿县志[M]. 光绪三年(1877)刻本.

[26] 民国孟县志[M]. 1932 年刻本.

[27] 民国林县志[M]. 1932 年石印本.

[28] 光绪寿张县志[M].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29] 民国泰安县志[M]. 1929 铅印本.

[30] 民国奉天通志[M]. 1934 年铅印本.

[31] 嘉庆东台县志[M]. 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32] 同治九江府志[M].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33] 嘉庆威远县志[M]. 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34]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 同治祁门县志[M]. 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36] 同治灵寿县志[M].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37] 民国洪洞县志[M]. 1916 年铅印本.

[38] 民国新篆云南通志[M]. 1949 年铅印本.

[39] 同治兴安县志[M]. 同治十年(1871)刻本.

[40] 民国禹县志[M]. 1939 年刻本.

[41] 民国南宮县志[M]. 1936 年刻本.

[42] 民国望都县志[M]. 1934 年铅印本.

[43] 光绪武阳县志[M]. 光绪十四年(1888)活字本.

[44] 光绪清河县志[M]. 光绪五年(1879)刻本.

[45] 咸丰安顺府志[M]. 咸丰元年(1851)刻本.

[46] 道光广东通志[M]. 同治三年(1864)刻本.

[47] 道光龙岩州志[M]. 光绪十六年(1890)补刻本.

[48] 同治宿迁县志[M].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49] 民国来宾县志[M]. 1937 年铅印本.

[50] 民国贺县志[M]. 1934 年铅印本.

[51] 民国续遵义府志[M]. 1936 年刻本.

[52] 同治湖南通志[M].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本.

[53] 光绪句容县志[M].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54]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M].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55] 宣统续纂泰州志[M]. 民国抄本,南开图书馆藏.

[56]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M]. 光绪六年(1880)刻本.

[57]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M]. 光绪四年(1878)刻本.

[58] 同治赣县志[M]. 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59] 民国德县志[M]. 1935 年铅印本.

[60] 光绪蠡县志[M]. 光绪二年(1876)刻本.

[61] 民国佛坪县志[M]. 1929 年刊本.

[62] 同治上海县志[M]. 同治十一年(1872)校正本.

责任编辑 张颖超

The Review of Academ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Jiaqing,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XU Yong-wen, BAI Xin-lia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Jiaqing, Daoguang, Xianfe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some new characters showed in academy teaching.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ety, the academy system tended to be corruptive, the qualities of teachers were reduced,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worsened, possessions were badly demolished, and the academy development slowed down. Thus, academy development began to decline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Jiaqing,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academy; development; decline